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By Xiaobing Tang.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0 pp.**

唐小兵這本研究梁啟超的著作，對非土生語言之運用能達行文流暢之境，實屬不易，尤難能可貴者是對當代流行的理論之掌握。今日漢語的史學著作，即使在中國史領域內亦不佔主導地位，主要乃不能用英語參與當代西方流行的話語，以致多半限於史料之處理，或停留在較前時期傳入過了時的話語上。即使今日西方這個中心對外緣傳播的理論是貼上「後殖民主義」「本土化」這類標籤，美國宗主國的地位仍無改變。

唐小兵這本史學著作帶有濃厚的時代性，具有鮮明的九十年代色彩。約瑟夫·李文孫(Joseph R. Levenson)在五十年代末研究梁啟超，用的是當時流行的心理傳記學，著重的是梁氏如何處理傳統價值和現代化之間的心理緊張。張灝稍後研究梁啟超，也擺脫不了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危機」論的窠臼。唐小兵用的則是最新修訂的理論「軟件」，把梁啟超現象變成了從現代主義朝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演變的思想歷程。

唐氏此書以梁啟超的史學為主線，旁及其他，敘事從 1902 年一直到他的故世，是迄今為止研究梁啟超涵蓋範圍最為廣闊的一本。他以 1902 年為上限，並認為是年梁啟超開始有現代國家觀念。因為 1902 年以前，「國」之觀念已逐步變化梁啟超的公羊三世說，故此說頗有商榷餘地。唐氏選擇 1902 年，乃是認定西方國家學「軟件」已在此時橫向移入，梁啟超的思想出現斷層。這在西式話語的霸權橫掃一切的意義上或許說得過去。

這個「軟件」就是用一個單線進步論的框架，把全球各地不同質的空間都佔取，把「空間」作一元性的時間化，讓發達的西方居於這個層級序列之頂點，其他各地則按符合西方準則之多寡各置高低。中國欲生存於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裡，就必須去佔取這個新的國家身分認同——其實是被這個話語

所佔取、由它進行衡量和判斷。唐氏這個論點，使他能參與當今包括杜瓦拉(Prasenjit Duara)在內對現代化國家論進行解構的嘗試。

西洋史對中國史的侵奪，即表現在 1902 年梁啓超提倡「新史學」之始就以西洋史爲主這點上。梁氏尤著重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的人物史跡，希望把這些典範的行爲移植於中國，推翻專制、實現自由民權、建立民族國家。但即使在傾向革命的 1903 年前，梁啓超仍然是一個政治溫和派。唐小兵指出：梁氏在法國大革命史中同情紀朗黨、在意大利建國史中偏向卡富爾首相；到 1905 年，與孫中山的革命派論戰後，他使用德國式保守自由主義來與革命派法國式暴民政治抗衡。

唐氏認爲維新和革命兩派論爭的焦點在：政治革命和社會經濟革命能否「畢其功於一役」，恐怕未必符合真情，蓋當時雙方激辯，關心的還是振興中華和排滿的「種族革命」等問題。梁啓超頗欲建立新的國民史學，卻盡量避免涉及本國史，似乎爲其當時的特殊政治立場所決定。在當日列強交侵情形下，國民史學的急務尤在樹立本民族抵抗異族的英雄，但中國近一千年來的例子多與抗蒙古抗女真有關。因此在革命派恢復黃帝紀元，而陳獨秀在安徽成立岳王會之際，梁啓超卻大樹特樹匈牙利抗奧地利的英雄葛蘇士，把他當做「黃種之光」。但國民史學迴避本國史終歸不得人心，因此梁啓超於 1902 和 1903 年先後發表避重就輕的古代抗匈奴英雄張騫、班超、趙武靈王傳。到他 1904 年明顯地倒向保衛滿清的立場時，反而寫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並在 1906 年讓蔣智由在《新民叢報》上發表分析岳飛在國民心理中重要地位的文章。

研究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萌芽，該涉及上述這些當時具體情況底下產生的疑難。唐氏計不出此，所以在分析梁啓超 1902 年著作的《新史學》部分時，所引用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就顯得有點空泛。梁啓超這部著作固然可以說成是在「普遍化的時間的視野」下營建「特殊的空間結構」（頁 75），但更重要的該是考訂出它所含各種思想的原始出處：如呂邦(Gustav Le Bon)的國民心理學、維爾康特(Alfred Vierkandt)的「自然種族和歷史種族」說等。

唐氏分析梁啓超晚年成熟期的史學，認爲它已進展到「後民族主義」，其中「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成分超越建國考慮，使之成爲「肯定本土

文化的新合法化策略」（頁 234）。用後現代主義的術語說，就是多元文化主義的「人類學空間」把一元性的單線進步的時間解構掉。在現代主義底下被時間當做「他體」的空間，到了後現代主義的思考中，反客為主。

唐氏說這種思想的背景是戰後西方殖民主義之退潮。須知戰後有一段很長時間——包括我當研究生時代——仍然是「現代化」理論當道，到唐氏當研究生的時代，後現代主義理論才大量流行。姑且不論此點，但把二次大戰的戰後和一次大戰的戰後等同，又怎能對梁啓超身處時代的具體情況作史學處理？一次大戰後的西方痛定思痛，對物質進步、科學萬能等價值產生質疑，加上自身內部工人運動抬頭、邊緣上俄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因此對非西方世界的道德的領導權發生根本動搖。中國思想界的保守勢力即藉此對極端反傳統、主張徹底西化的新文化運動進行反擊——而梁啓超即其重要的一環。

在八十年代的美國，保守派也會運用本土化「文化政治」對自由派發動反擊，這似乎可同梁啓超晚年的史學相比。但今日搞「文化政治」最成功者卻是與保守派對立的非白人中心的多元文化主義。唐氏因此力爭梁啓超向西方宣告獨立的「文化政治」不應被狹窄地貶作反動保守，似乎也言之成理。但值得商榷的是所謂「後民族主義」，姑勿論二十年代的中國尚未建國成功，梁啓超認為立國必須本於民族特性的主張早在民國成立之前已經出現，而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國風報》時代已經充分發揮，它根本不是民國成立以後才出現的較深沉的文化思考。

至於說梁啓超的文化政治為中國文化營造了一個「人類學空間」，我把梁氏二十年代的著作仔細重讀一遍，怎麼讀也不覺得有這個解讀的可能性。梁氏參與的是當時流行的一個話語，包括杜亞泉、李大釗、常乃惠等人，他們都認為西方文明已出問題，世界正待一更高階段文明之誕生，它或是社會主義、或是新俄羅斯、或是東西文明之整合，其中有人把西方社會主義的抬頭說成是轉向中國的人本位文化。而梁漱溟和泰戈爾等人甚至提出「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的命題，認為世界性的文明不能偏廢其一。梁啓超並不能超離該時代，他關注的也是新興的世界「文明」問題，主張中國人不該妄自菲薄，如能把自身精神遺產去配合西方物質基礎，或可以拯救全人類，而不是去提倡遍地開花的多元文化主義。

唐氏閱讀後現代主義文獻用功很勤，論述多元的本土化「空間」如何顛覆一元化的「時間」的理論著作收集齊備，書單對讀者貢獻很大。但談梁啓超二十年代的史學，仍必須考訂當時的思想出處。梁氏歷史哲學中很重要的「心力」概念，很明顯的便是來自柏格孫(Henri Bergson)——在此哲學體系裡，以「時間」為形式的意識流是創造的泉源，創造出來的成果僵化成制度才是流於「空間化」。梁氏從史跡中看出「人格」作用，亦有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學的影響。談梁氏的史學，尤其不能隻字不提的是當時流行的社會心理學之「群心」說。在對這個學說的主張上，梁氏近似美國魯賓孫(James Harvey Robinson)在1912年發表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其實，該時「群心」說已開始受新興的行為主義者攻擊，正成為過時理論。

今日中國正為「後學迷」所籠罩，唐氏似乎未能免俗。但這方面的論者常把「現代化」與「現代主義」混同。前者仍然是十九世紀單線進步觀的持續，後者則演變自十九世紀末的頹廢風，否定現代生活是進步，並對它提出抗議，在精神上反倒接近今日の後現代主義。如以為「後現代主義」是從全面否定「現代主義」而來者，多不諳有此轉折，反倒把它簡單化為一元性的時間進程框架。

任何內容豐富的著作，稍許技術性的錯誤在所難免。唐氏此書如有機會再版，不妨考慮更正下列幾項：頁15，內村鑑三(Uchimura Kanto)的名字英譯作Kanto，應作Kanzō。頁219上的Max Wundt為Wilhelm Wundt之誤。頁232上謂赫爾特(J. G. von Herder)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侵德後「對民族主義的冒現作出首次理論貢獻」，其實赫爾特的時代處於法國革命和拿破侖之前，他反對民族沙文主義，視人類文化為花束，各民族的文化則比作不同的花朵，都應讓其盛開，似乎乃一個早期的多元文化主義者。

孫 隆 基

University of Memphis